

贵州省武陵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2011协同创新中心成果
铜仁学院武陵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铜仁学院国学院研究成果



学 | 术 | 专 | 著

杨树达 文字学思想 与古文字考释

肖 峰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www.csupress.com.cn

贵州省武陵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2011协同创新中心成果
铜仁学院武陵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铜仁学院国学院研究成果



学 | 术 | 专 | 著

杨树达 文字学思想 与古文字考释

肖 峰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www.csu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树达文字学思想与古文字考释/肖峰著.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487-2461-2

I. 杨... II. 肖... III. 汉字-古文字-研究 IV. H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9784 号

杨树达文字学思想与古文字考释

肖 峰 著

☐责任编辑 何彩章

☐责任印制 易红卫

☐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麓山南路

邮编:410083

发行科电话:0731-88876770

传真:0731-88710482

☐印 装 长沙市井岗印刷厂

☐开 本 720×1000 1/16 ☐印张 18.5 ☐字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7-2461-2

☐定 价 4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请与经销商调换

序一

遇夫先生是现代湖湘学者的杰出代表。他的学术成就虽不能说独步天下，但能出其右者并不多见。这从他先后两次成为民国和共和国时期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可以想见。虽然不能仅凭这一点来确定他的学术地位，但他的著作作为他崇高学术地位的确定提供了坚不可摧的证明。

杨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训诂学、语法学、修辞学、文字学等方面。

训诂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汉书窥管》上，陈寅恪读此书后称其为“海内训诂第一人”，绝非朋友间的溢美。只要读过《汉书窥管》，就不得不服膺杨先生的学术功底和成就，学界称为汉圣，绝非虚美，也不得不服膺陈先生的学术眼光，能在训诂学林中发现至善并表而出之，不仅要有如炬的眼光，还得要有壮士的勇气。

语法学、修辞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高等国文法》《词诠》《中国修辞学》，现代研究语法修辞者，谁能不参考这几部著作？谁能绕过这几部著作？如果有人说他没读这几部著作而研究了汉语语法修辞，我会借用季羨林先生对某人研究敦煌学的评价：“这个方面，他还没入门呢”。

文字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甲文说》《积微居金文说》和《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文字学概要》是教材，但杨先生的文字学思想大多体现在此书中，所以研究杨先生的文字学思想离不开《中国文字学概要》，但真正代表他的文字学考证成就的是他的《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甲文说》《积微居金文说》。杨先生以训诂入文字，他深厚的训诂功底，为他的文字考证助力多多，每识一字，每发一义，都有扎实的文献作为证据，故其考证，大多可靠可信，与仅以字形揣测者比，不可以道里计。如：

鼎铭云：“易女鬯一点，冂衣，市𠂔，𨋖马。”冂字旧皆释为冕，余按冕为弁冕，冕衣不辞，疑冂乃𠂔字，𠂔衣即褰衣也。《说文·衣部》云：“褰，𦑔衣也，《诗》曰：‘衣锦褰衣’，示反古。从衣耿声。”

纵使是人们认为荒诞不经的旧说，他也用其独到的眼光，扎实的功力，给予正本清源。如《说文》：也，女阴也。学者皆以为荒诞。但杨先生认为《说文》的说法是正确的。他以“地”“池”“施”等字的从“也”声而有“阴”义来证明许慎释义的正确，证据凿凿，不能不信，可谓许氏之功臣。大多数学者认为“也”

是“匚”的初文，而不是女阴，然而古人造字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也”取像于人身，有何不可？焉知“匚”不是取像于身？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释“也”为女阴。杨先生赞同许氏的解释，我们赞同杨先生的证明。

对杨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研究者不多，这是对历史的无视，也是对杨先生的不公。友生肖峰君以杨先生的文字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从其论述中发掘其思想，从其考证中发掘其成就，是则是之，非则非之，不为长者讳，不为贤者隐，实事求是，多有发明。尤其是对学界的不同意见，肖君能从历史的角度，给予正确的、合理的而不是意气的评价。实为杨氏之功臣，亦杨氏之诤臣，功在学林，利在千秋。

杨先生的训诂学、语法修辞学亦可深入研究，我们期盼这方面的成果出现，肖君有意乎？如此，则功莫大焉，善莫大焉。无量天尊，善哉善哉！

蒋冀骋

于湖南师范大学无知斋

2016.9.11

序二

20 世纪初以来,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的发现把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带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科学古文字学开始建构并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受此影响,传统文字学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和进步——中国文字学的研究走进了古文字学和传统文字学相辅相成的新的历史时期,有的学术史著作把这一时期称为文字学研究的“拓展时期”(见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其拓展性就是表现在对传统文字学的突破和古文字学的开新。在这样的一个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往往兼具传统文字学和古文字学的专长,两相结合,为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杨树达先生即是这一时期颇具特色的著名学者。

杨树达先生的文字学研究,根植于其深厚的小学功底,善于将文字、音韵、训诂融会贯通,又兼顾文法和修辞,博洽而谨严,在传统说文学和古文字学两个方面均有重要建树,他的《积微居甲文说》《积微居金文说》《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国文字学概要》等著作,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重要成果。他的新识字“十四条”以及“每释一器,首求字形之无牾,终期文义之大安,初因字以求义,继复因义而定字,义有不合,则活用其字形,借助于文法,乞灵于声韵,以假读通之”的著名论断,是作者丰富治学经验的总结,在方法论上有重要价值,每每为学者所称赏,亦为后学指引道路。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各个历史时期的每一个学者及其著述,都应该进行细致的研究。一般学者值得研究,重要学者更应该研究。像杨树达先生这样著名的学者,我们的研究还是偏少,特别在文字学领域,显得不够系统和深入。2010 年杨树达先生嫡孙杨逢彬教授来榕,正值博士生肖峰考虑论文选题之时,受杨教授的启发,作为湘籍后学的肖峰,很快确定以杨树达先生的文字学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地缘人缘促成此课题,亦一佳话也。

肖峰在通读杨树达先生有关著作的基础上,选择其文字学研究的若干专题进行梳理和探讨,包括六书研究、初文研究、形声字研究和古文字考释方法研究等,重点分析了杨氏指事字的符号理论、本字的加旁方式、形声字中形符的“泛”“切”问题和声符的“通借”问题以及他的古文字考释方法及其实践等。这些专题应该能够体现杨树达先生文字学思想的专精和超越前人之处。从总体上看,肖峰的分析能够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其学术源流和发展脉络,也能够从横向的比较中把握

各自的特点，对各专题的本体研究也不乏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一些见仁见智的问题，能够秉持客观态度，一抒己见。这些都是作者积极思考的表现，也是论文值得肯定的地方。肖峰君对杨树达先生文字学专题的选择和研究，对进一步了解杨氏的文字学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学术史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肖峰为人耿直，下笔为文也快，既是优点也算缺点。就文章而言，快笔成文虽然酣畅，但打磨不够的问题也是难免的。毕业后他对文章进行了修订，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杨树达文字学思想与古文字考释》，就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学术研究总是不断前进的，任何时候提交出来的成果其实都是阶段性的成果，它的优点和缺陷，摆在读者面前，读者诸君自可评判。作为老师，当然是希望学生能够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努力探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不断获得新的进步。

是为序。

林志强

2016年8月30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杨树达生平与著述	(1)
一、幼承家学 (1885—1897)	(1)
二、问师求学 (1897—1911)	(2)
三、设教治学 (1911—1956)	(2)
四、杨树达文字学研究相关情况简介	(4)
第二节 本书研究相关情况说明	(7)
一、杨氏文字学思想的研究现状	(7)
二、该选题的研究趋势和学术价值	(12)
三、本书研究对象、总体框架、重难点和研究目标	(14)
四、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及学术观点方面的创新	(15)
第三节 本书内容设置情况简介	(17)
一、各章节内容简介	(17)
二、各章节内容的逻辑关系	(19)
第二章 杨树达六书研究	(21)
第一节 杨树达象形研究	(23)
一、传统象形研究回顾、学界对杨氏象形研究的评价和 研究新思路	(23)
二、杨树达象形研究的内容介绍	(26)
三、《中国文字学概要》与《文字形义学》象形对比 研究	(31)

四、杨氏与杨桓、王筠象形对比研究·····	(34)
五、杨氏象形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40)
六、杨树达象形字疏证举例·····	(42)
第二节 杨树达指事研究·····	(45)
一、杨氏对传统指事理论的借鉴与发展·····	(45)
二、传统指事分析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50)
三、杨氏对前人指事字归字的调整与认定·····	(56)
四、杨氏指事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60)
五、杨氏指事字疏证举例·····	(63)
第三节 杨树达会意研究·····	(69)
一、会意研究的历史回顾和学界对杨树达会意研究 现状介绍·····	(69)
二、杨树达会意研究内容介绍·····	(71)
三、《概要》与《文字蒙求》会意归字比较·····	(79)
四、杨树达会意研究的贡献和存在的不足·····	(81)
五、杨氏会意字疏证举例·····	(86)
第四节 杨树达其他三书研究·····	(89)
一、形声研究·····	(89)
二、假借研究·····	(94)
三、转注研究·····	(97)
四、总结·····	(98)
 第三章 初文、本字与加旁方式研究·····	 (101)
第一节 杨树达初文研究·····	(101)
一、初文研究源流、概念及杨氏初文考释范围·····	(101)
二、杨树达初文考释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	(106)
三、杨树达初文研究的学术贡献和不足·····	(118)
四、总结·····	(120)

五、杨树达初文疏证举例	(121)
第二节 杨树达本字研究	(124)
一、杨氏对传统本字研究的继承和学界对杨氏本字 研究的评价	(124)
二、杨氏本字定义之讨论	(126)
三、杨氏本字研究的范围和本书对杨氏本字研究的 考察重点	(129)
四、杨氏《彝铭中之本字》内容介绍	(133)
五、杨氏本字研究的特点	(168)
六、杨树达彝铭本字研究的学术贡献和不足	(134)
七、杨氏彝铭本字疏证举例	(137)
第三节 杨树达加旁方式研究	(139)
一、概述	(139)
二、王筠、唐兰加旁研究述略	(141)
三、杨氏加旁方式研究的内容	(143)
四、杨氏加旁方式研究的学术贡献	(152)
 第四章 杨树达形声字研究	 (159)
第一节 杨树达义近形旁任作研究	(159)
一、义近形旁任作的概念、研究历史和学界对 杨氏研究情况介绍	(159)
二、杨树达义近形符任作研究内容和特点	(160)
三、杨氏义近形符任作研究的学术贡献和不足	(166)
四、义近形符通用的个人思考	(168)
第二节 杨树达形符“泛”“切”研究	(172)
一、杨树达先生形符“泛”“切”的论述举要	(172)
二、杨树达先生形符“泛”“切”研究例字析评	(174)
三、杨树达先生形符“泛”“切”研究例字补正	(176)
四、总结	(178)

第三节 杨树达“通借”研究	(179)
一、杨树达“通借”研究情况介绍	(180)
二、杨氏“通借”理论探析	(185)
三、杨氏“通借”例字指取	(187)
四、总结	(190)
五、杨树达“通借”字疏证举例	(190)
六、学界对杨氏“通借”研究评价辨析	(196)
第四节 形符探微	(204)
一、形声字形符添加的时间确定	(204)
二、形声字形符添加的两种主要模式	(206)
三、两种模式不同特点及“同旁不同类”溯源	(210)
 第五章 杨树达古文字考释研究	 (213)
第一节 考释方法的三个发展阶段	(213)
一、考释方法的探索期	(213)
二、考释方法的总结建立期	(214)
三、古文字考释方法论的建设期	(216)
第二节 杨树达考释理论与金文考释“十四条”	(220)
一、杨氏考释理论在学术界的不同评价和著者的 个人看法	 (220)
二、杨氏金文考释“十四条”内容与学界评价	(227)
第三节 杨树达在甲金文考释中所体现出来的考释 方法分析	 (231)
一、概述	(231)
二、杨树达在考释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考释方法	(231)
三、杨氏考释方法的特色	(239)
第四节 杨树达古文字考释上的贡献	(242)
一、考释成果直接认可并称引者	(242)
二、古文字考释对后学的启发	(246)

第六章 总论	(249)
第一节 杨树达文字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分析	(249)
一、学术价值分析的原则	(249)
二、首创价值	(250)
三、传承价值	(252)
第二节 杨树达文字学研究的时代性和局限性	(255)
附录	(257)
一、2007 年版《积微居金文说》	(257)
二、《积微居金文余说》	(269)
三、《积微居小学述林》	(275)
四、《积微居甲文说》	(277)
参考文献	(278)
后记	(283)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杨树达生平与著述

杨树达（1885.6.1—1956.2.14），字遇夫，号积微翁，晚年更号为耐林翁，湖南省长沙市人。我国近、现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和史学家，在文字、训诂、语法、修辞、音韵、方言和历史研究等方面均有很高成就。他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湖南文史馆馆长等职务。他的生平与著述，《积微翁回忆录》记载非常详细，是我们了解他社会和学术活动情况的重要材料。在此前研究他语言学思想和成就的学位论文里，周孟桦的硕士论文《杨树达文字形义理论初探》、卞仁海的博士论文《杨树达训诂研究》在这方面都已经作过很好的研究，本文以《积微翁回忆录》所介绍的情况为基础，结合上述两家的研究成果，对他的生平和著述作个简要的陈述。

卞仁海在他的博士论文《杨树达训诂研究》绪言第一节里，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幼承家学（1885—1897）、问师求学（1897—1911）和设教治学（1911—1956）。其中，问师求学时期又分为长沙时期和日本时期；设教治学时期，又细分为四个时段，分别是长沙时期、北京时期、避难战后四年和建国以后。这样分期，既照顾到了杨树达由学生到授教身份的转变，也兼顾到了他的活动范围、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个人具体的学术研究方向的转向等多种因素，条理上还是很清楚的，因此，我们基本按照他的这一思路来叙述。

一、幼承家学（1885—1897）

杨先生自己在《积微翁回忆录》里写道：“是年四月十九日，生于长沙北门正街宗伯司臣坊侧之赁居”。其他著作介绍他出生的时间为6月1日，大概按的是阳历，而这里按的是阴历。卞仁海提到，杨先生父亲“名孝秩，字翰仙，黯熟经史”。“喜读《史记》《资治通鉴》、唐宋八家古文”。从杨先生自己的回忆来看，“是年（1890年）先君为人授徒，”“外祖遂令舅氏从先君受业”。从这里可以看出杨先生父亲的小学、经学和史学功底是很不错的。而杨先生5岁^①（1889年）时“大

父炳南公教余识字”，6岁（1891年）时，“于是先君始得安居于家，训吾兄弟焉”^②。而至1897年前，杨先生父亲教导他们兄弟俩的学习内容基本是“诸经、古文”。这种深厚的家学渊源，为杨先生以后从事古文字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问师求学（1897—1911）

此阶段又分为长沙时期和日本时期。1897年以后，杨先生在长沙先后就读于时务学堂、求实书院，当时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等正好在时务学堂任教，杨氏因此得以结识了梁启超，这也为他以后在北京执教时跟梁启超进一步交往作了铺垫。由于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在于宣传维新，培育了杨先生兼容并蓄思想和开放的治学态度，这也成为他以后从事学术研究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在时务学堂解散后到去日本求学之前这段时间里，据卞仁海的研究，杨先生先后“受父命师事文字版本学家叶德辉习《说文解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日后研究打下了小学基础和目录学基础”。1903年，“年来治经之志甚切，遂偕伯兄同往问业于湘潭胡子威先生（元仪），先生以经学名也”。有清以来，学者多以小学治经学，以经学通小学。这些学习经历，十分有益于杨先生中年以后的文字学研究。

1905年，“适湖南巡抚端公方拟派学生赴日本”，“余遂亦往应试，皆得录取”。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清庭垮台，“官费无着，别日本返国”。在此期间，杨先生在《词诠·后序》中提到，他力治“欧洲语言及诸杂学”，“喜治欧西文字，于其方法，颇究心焉”。这些学习经历，直接影响了他日后所研治的语法学和修辞学，对文字学的研究也有间接影响。

三、设教治学（1911—1956）

这是杨树达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时期，时间跨度长，因此，按社会历史和他活动范围，将其细分为四个阶段。

（一）长沙时期（1911—1920）

这一时期杨先生的主要工作还是在教学上。自1911年8月任湖南教育司“图书科科长”以后，数易其职，如“湖南图书编译局编译事”“楚怡工业学校英文教员”“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等，而“任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国文教员”时间最长，“计任此职凡四年，至八年冬北游始去职”。

（二）北京时期（1920—1937）

杨树达去长入京的原因，依《积微翁回忆录》记载，先是由于1919年长沙学界“发起驱张（张敬尧）运动”，推举他“为入京代表”，入京后，“见诸任教大学

者每周授课不过八、九时，自修时间绰有余裕，每心羨之。”1920年8月，“遂再北游”。从杨先生的职业来看，经同乡黎锦熙之介绍，“到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任职，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国语法、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日文教员”。1921年，“以钱玄同之介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法教员”，1926年经梁启超举荐，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授，直到1937年他因父亲老病陪侍而南归长沙。由于北京的特殊地位，这一时期人才汇集，杨先生也因此结识了学术界尤其是语言学界众多名家。1922年5月，杨氏参加思误社（后改“思辨社”），结识章太炎弟子吴检斋（承仕），此后又与他的老师梁启超重逢。除此之外，杨先生陆续结交的学者还有王国维、章太炎、黄侃、沈兼士、张尔田、董作宾、于省吾、林义光、郭沫若、曾运乾、余嘉锡等人，也认识了学生辈如王力、李芳圃、高亨、鲁实先等人。这无疑大大促进了他的文字学研究：王国维是他文字学研究最首肯的一位学者，我们阅读《积微翁回忆录》就会发现，除了发出“阅《说文籀文考证》，取王静安《史籀篇疏证》对勘，功力深浅较然明白。甚矣，学力之不可诬也！著者早年不喜金文，晚年知金文之美，而已不及专治矣”的遗憾外，溢美之词常发自肺腑，“阅王静安《殷先王先公考》，读书之密如此，可谓入化境矣”等等。而对王氏的批评相当少见，这种评价只有孙诒让能与之比肩。而其他学者，包括黄侃在内，杨先生在学术评价上多有异词。与杨先生交往密切的学者中，吴承仕与沈兼士在小学上的功底很深，林义光是著名的金石学家，与杨先生是清华同事，这些人对他由训诂学转文字学研究，有相当的影响。而同董作宾、郭沫若与于省吾的交往，对杨先生在甲、金文的深入研究，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杨先生的著述来看，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集中在修辞如《中国修辞学》（1933），语法如《词诠》（1928）、《中国语法纲要》（1928）、《高等国文法》（1929）、《马氏文通刊误》（1931），训诂如《盐铁论校注》（1924）、《汉书补注补正》（1924）、《淮南子证闻》（1936），另有以文字研究为主、夹杂有训诂和音韵研究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1936）。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杨先生虽然没有正式从训诂学转入文字学研究，但说文学研究已经开始，甲骨文研究已初见端倪，金文研究也处于未雨绸缪阶段。

（三）避难和战后4年（1937—1949）

1937年5月，杨树达经武汉回家省亲，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家眷南逃归湘，次日“湖大送聘来”，杨先生始任湖南大学教授。1938年10，“卅一日，乘湖大校车别长沙，晚抵桃源”。而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三十日，抵长沙，

登岸直赴岳麓山本校”，在湘西整整7年。这一时期，除教学授课、组织诗社作诗答酬而外，杨先生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字学的研究上。《积微居小学述林》的大部分篇目写于这一时期；《中国文字学概要·文字形义学》一书，虽在37年以前已有初稿，44年后亦时有零星增补，但主要还是定形于这一时期；金文研究的第一篇跋文《令鼎跋》作于1941年1月3日，也是这一时期；甲骨文的研治，虽要早于1937年，但其大量攻治，亦在这一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杨树达文字学研究的黄金时期。

（四）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1956）

新中国成立以后，杨树达继续担任湖南大学教授一职，1953年，湖南大学文法学院取消，转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⑨。这一期间，杨先生一方面继续自己以前的文字学研究，另一方面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对自己以前著述的订补和校勘上。有关他著作的著述、校勘和出版情况，可参考周孟桦在参阅《积微翁回忆录》基础上而完成的《杨树达著述出版略表》，“国立”中央大学（台湾）中国文字研究所硕士论文《杨树达文字形义理论初探》，2006年，第19至22页。

四、杨树达文字学研究相关情况简介

杨树达在语言学、史学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当时就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即使到现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仍然还是相关领域的必读经典。在他的学术研究之中，文字学研究又最能代表他的整个学术成就。从研究内容上看，他的古文字研究可分为说文学、金文和甲骨文研究。

在说文学方面，杨先生最初在这方面的学习可以追溯到他儿童时代的识字、习经和在叶德辉指导下对《说文解字》的系统学习；从研究情况来看，他的一些训诂性质的著作有时也会牵涉到文字学的研究内容；而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文字学研究，应数《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对一些单字的考释，他的第一篇说解小篆形体的文章是《说制》，后收于该书的第二卷。系统研究《说文解字》的时间可以确定在1934年9月，据《积微翁回忆录》记载，这一时期他在清华大学教授《文字学》这门课程，于是“编文字学讲义”。周秉钧在《中国文字学概要·文字形义学》的“后序”中说该书“是杨遇夫先生在湖南大学任教时的讲义”。据我们推测，杨先生湖南大学任教时的讲义应参照了清华大学的讲义，后者才是该书的真正源头。该讲义“分象形为纯形、杂形、符形、省形、复形五种”，对比《中国文字学概要》将“象形”分为“独体象形”“复体象形”“合体象形”和“省体象形”，不

难发现其中的继承关系：“纯形”对应“独体象形”、“复形”对应“复体象形”、“杂形”对应“合体象形”、“省形”对应“省体象形”。从《中国文字学概要》的目录来看，“合体象形”一节，共列七类，而七类中，唯独第七类的“本形与杂形”又列四小类，而在这四小类中第一小类里的“杂形表所”再析出“示所从”和“示所在”两类。大体可以推测《概要》的“合体象形”是清华大学讲义中“杂形”一类的进一步扩充和完善。两书相比照，讲义有五类，《中国文字学概要》只有四类，缺“符形”一类，所谓的“符形”到底是指什么，“符形”的“符”是不是与他说所指事中的“符号”有相合之处，或者是不是指“状事象形”，由于证据缺乏，尚不好做太多猜测。但不管怎么样，《中国文字学概要》以清华大学讲授文字学时的讲义为蓝本，问题应该不会太大。此外，杨树达清华大学讲授文字学的讲义，也是有所本的，“余初以吴检斋《六书条例》为底本，而分类与彼不同。于彼所谓合体象形者，思最苦，盖排列四次而后得之”。因此周孟樵说，杨树达“六书观念深受章太炎之影响”，杨氏的“六书”理论借鉴了吴承仕，而吴又是章的学生，说他深受章太炎的影响也就理所当然了。

在金文方面，杨树达最初接触金文当始于1925年5月，“读孙仲容《古籀拾遗》，心颇嗜之。当时于金文，未一寓目也”。而正式攻治金石文字，应该是1931年10月，“撰《汉西乡侯兄张君残碑》及《魏曹真残碑》二跋”，“治金石之学实始于此”。其后，在这方面的学习也日渐勤奋：一是表现在与此前结识的同事、金石学家林义光先生时有切磋，“前以近作《汉碑跋》……寄林药园（义光）求教”，与吴承仕、沈兼士等人亦多有讨论。二是开始大量阅读金文书籍，“在某处见严可均《说文解字翼》稿本十五卷”，“书取金石文字与许合者录之”。三是开始撰写金石类的文章，不过这部分文章均属于汉碑一类，且多注重考史，单字考释则多立足《说文》，并多以小篆形体为主。象《释晋》（1934）一文将甲骨文、金文、小篆等熔于一炉来考证，是他古文字考释的新气象，不过不多见。《中国文字学概要》一书，例字下往往广搜甲骨文、金文等古文，而此书虽以1934年底清华讲义为底本，但最终成书于1944年，其中也经过多次修订。这时期由于已经开始攻治金文，在修订过程中增补金文的字例应该是可以推知的。经过十余年的金石学的学术沉淀和积累，到1941年初，他的金文功底已相当厚实。而真正触动他的研究动机和撰写兴趣的，是郭沫若。1940年12月底，“阅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洋装本，觉可商之处颇多”。时隔一周，杨树达便写下了他的第一篇铭器跋文《令鼎